

# 問學

中华文艺复兴论 1

李 森 主编 林建法 宗仁发 执行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 學門

中华文艺复兴论 1

李 森 主编 林建法 宗仁发 执行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问：中华文艺复兴论. 1 / 李森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360-7657-0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汉语—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0449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林宋瑜

责任编辑：林 菁 揭莉琳

特约编辑：林建法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庄海萌 程俊睿

---

书 名 学问：中华文艺复兴论. 1

XUEWEN: ZHONGHUA WENYI FUXING LUN. 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3 插页

字 数 240,000 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b.com.cn>

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

## 《学问》丛书学术委员会：

### 顾问：

李泽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李欧梵 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刘再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高级研究员

欧阳桢 (Eugene Chen Eoyang)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 主任：

吴 松 云南大学原校长、教授

### 委员：

陈安娜 (Anna Gustafsson Chen) 瑞典国家图书馆馆员、汉学博士、翻译家

陈 益 (Samuel Chen) 牛津大学研究员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曹意强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达西安娜·菲萨克 (Taciana Fisac)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汉学家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贺麦晓 (Michel Hockx) 伦敦大学教授、汉学家

胡晓真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长、研究员

李 森 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学问》主编

鲁晓鹏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

林建法 《学问》执行主编、《当代作家评论》原主编、编审

刘伟冬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罗 然 (Olga Lomova) 捷克查理大学教授、汉学家

千野拓政 (Senno Takumasa)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汉学家

石江山 (Jonathan Stalling) 美国奥克拉马大学教授、汉学家

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杨慧仪 (Jessica Yeung)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叶 波 (Paul van Els)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汉学家

俞晓群 北京海豚出版社社长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

宗仁发 《学问》执行主编、《作家》主编

# 目 录

## 中华文艺复兴论坛

- 001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的起点
- 027 刘再复 刘剑梅 读海居共议读书与写作(上)
- 041 陈众议 多元与核心  
——从“文”与“化”说起
- 052 李森 色·彩语言诸相的漂移  
——漂移说层次之一

## 百家

- 082 邓德隆 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
- 087 杨斌 谁是李泽厚?

## 文心雕龙

- 093 [美] 约翰·雷乌巴渥 (John Neubauer) 著 王浩 译  
全球化的文学史

## 诗品

- 109 [ 英 ] 米高 · 安甘 (Michael Ingham) 理查德 · 安甘 (Richard Ingham) 著  
杨子琴 译 句法与潜文本  
——论莎士比亚及同时代剧作家诗剧的历时句法变量、  
时空移位和邻近感
- 134 海 男 穿越西南联大挽歌 (选载)
- 165 张学昕 闫海田 紫色记忆：忧伤的灵魂时间  
——读海男的诗集《忧伤的黑麋鹿》

## 民国学术

- 175 张昌山 民国学术史丛谈 (三则)
- 187 沈卫威 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

## 游于艺

- 221 王 新 孤往雄心 (上)  
——“德国学派”艺术家全显光之艺术教育研究

## 同文馆

- 229 阎连科 高 方 阎连科谈文学与翻译
- 243 [ 瑞典 ] 万 之 历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新译

# 历史本体论的起点

李泽厚

李泽厚二〇〇六春季纽约大学讲座

时间：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七日上午

地点：纽约大学东亚系

与会教授：张旭东（比较文学系、东亚系教授）、Moss Roberts（东亚系教授）、Zvi Ben-Dor（中东研究系、历史系教授）

与会学生：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历史系博士生

**张旭东：**

我先说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今天毫不夸张地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们都应该知道李泽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从我个人来讲，读他的书已经有二十年了，这段历史很重要。今天我们在座不仅仅是梳理当代中国学术史或者观念史，也不只是在一个狭隘的学术意义上对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讨

## 【作者简介】

李泽厚，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论，比如当代中国的Marx研究、Kant思想研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整个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是否还是可能以比较系统的方式考虑全盘问题。在座诸位对当代中国学术都有相当的了解，在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思想史和历史研究等领域也和当前的中国学术有所接触：汪晖前几日就在这儿，等等。但这些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基础？这不光是单纯的学术基础，而是怎样找到一个历史脉络的源头和起点，使得它可以不断地生发出新的内容来。我想，李泽厚代表了几个源头性的东西，第一，最直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脱马克思主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尤其在年轻一代学者中，Marx不占他们学业的主要地位，很多人甚至是有意识地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排斥掉Marx的成分，但我们知道，当代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不能离开对自己Marx思想的历史发展。第二点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和西方经典思想的联系，比如李泽厚的Kant研究就提醒我们Kant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一个起点，它提出一系列有关主体性的问题、理性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很难绕过的。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怎么和经典的现代性理论发生关系，如何通过对西方经典的阐释来开拓自己的下一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年轻一代的学生可能是从M.Foucault，或者J.Derrida、F.Jameson、E.W.Said等当代思想家入手讨论问题的，那么如何处理当代思想和经典思想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第三就更重要了，但可能也是我们最难处理的，即如何处理中国传统以及儒家思想，如何清理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并和广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关联，等等。李泽厚的工作不止是这三方面，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三方面来清理，来想一想自己学术工作的真正前提、基础和源头。这不是每一个人简单地认一个discourse来继续从事学术生产。我希望大家带着这个意识来参与今天的讨论。我就先讲到这里，泽厚要不要说两句开场白？

### 李泽厚：

首先抱歉一下。本来我应该去年四月来的，机票都已经给我寄来了，但是因为生病开刀，没有办法来了。最近三月份写的文章《情本体、两种道德和“立命”》，算是这次的讲演稿吧。我想说一点程序上的问题，现在我的记忆力很差，所以我可能会打断你们的话，提出问题，否则我就忘了；你们也可以随时打断我，提出问题，展开辩论。在《历史本体论》那本书里，我说我讲的都是大众哲学，即至少在语言上和形式上我讲的都是大白话，直白道来。为什

么要这样，我以后再解释。总之我讲的都是大白话，也许你们听起来不习惯，昨天我已经说了，请你们张老师翻译成规范化的学术语言。（张旭东：这已经是对大家的批评了。）那倒不是，这是实在话。

**张旭东：**

我们的seminar是两天，四个主题。今天上午是Kant主体性哲学和历史本体论的问题，下午是Marx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是李泽厚对Marx的抽象劳动概念的批判。今天的问题基本上是相连的，我们争取三点半结束，让泽厚有时间休息一下。Kant、Hegel、Marx是相联系的，合在一起谈也可以。

**李泽厚：**

欢迎大家直接提反对意见，我不怕挑战，我这个人很喜欢辩论。

**学生1：**

我先提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的问题，是关于主体性的英译问题。对这个subjectivity，您好像使用了“subjectality”来表示。希望您通过这个翻译，讲一下对主体性的总体看法。

**李泽厚：**

谢谢。这是我自己的创造的一个词。Subjectivity在西方语境里是主观的意思，是讲意识、心理、精神等方面；而主体是讲人相对于自然界和外界的客观的整体活动和存在，从而形成一个主体。Marx里面讲的实践恰恰就是讲这个人（类）的主体，不是Hegel讲的精神主体。Marx的《论纲》里面的主体讲的是人类这个族类作为一个物质存在，它的生存活动是最根本的。在我的Kant书里，我自己一个重要想法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人类作为一个族类，它的存在的最大特点是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这就是实践，主体性最主要的活动以及和动物的重要区别是这一实践。以前南斯拉夫有个实践派，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实践”的定义，因为他们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算作实践，包括写文章、讲演等都是“实践”。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只有主体的物质的现实性的活动才是实践，因之，我讲的最根本的实践是使用和制造工具，认为这是人类生存延续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思想的活动。Kant提出的是：人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我讲人类如何可能？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看法。人类的存在是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那么区别人类和动物就不是语言、理性，或者心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我很高兴的是，上个月的Scientific American，一本很普及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人类学的文章。有

科学家在苏门答腊研究猿猴的行为，结论是它们“got intelligence through culture”。那么这个culture是什么呢？答案是“tools use”。尽管它们还不是人类，但说明文化、智力都不是先天或先验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实证科学的结论和我在三十年前提出的把制造和使用工具作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的观点可以相通。现在很多人都把语言作为人类的起源，我是不同意的。Engels也讲过由猿到人，但他没有像我这样讲过。

### 学生2：

我想接着您对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阐释问一个关于实践、语言和美学的问题。您不同意语言是实践，同样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定义里您也排除了语言，那么，作为一个诗人，他主要是用语言来创造。那么您怎么把物质的存在与语言和审美的东西联系起来？

### 李泽厚：

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方面。第一，这里有一个方法上的问题，从一个基本的东西到比较高层的东西，这个连接是要经过很多层次的，需要很多中介。我在八十年代就讲过这个问题，要从一个基础的东西来直接解释高级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有人就问那么艺术创造美怎么解释呢？这里面有很多曲折的不同层次的中介，不能从一个基础理论来解释一个隔得相当远的具体现象。第二，关于语言问题。我并不排斥语言的重要性。动物也有交流，它们也用语音来作 communication。人的发音器官也许比动物强，但更重要的是语义在语言中得到了保存，尤其是保存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含义，而不仅仅是通过声音传达表情或者某种信号。人的语言保留的经验主要部分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我认为这是人的语言不同于动物语言的一个根本原因。语言保存语义和制造—使用工具是同步的。我比较赞同语言学中的手势语学派，他们讲在发声前或同时有用手势、肢体动作来交流沟通的语言，我以为这正是对制造—使用工具的经验的保存、传递和教授，其中包括模仿。

### 学生2：

那您对E.Cassirer的符号哲学以及新康德主义那一套基本持否定态度？

**李泽厚：**Cassirer讲得还是很清楚，我还是蛮喜欢的。到现在为止，二十世纪的哲学基本是语言统治的哲学，不管哪一派，分析哲学，Wittgenstein不用说了，从Heidegger到Derrida都是这样。但我对此很怀疑，我觉得语言恐怕不是最根本的。这牵涉很大的问题。这里有基督徒吗？约翰福音的开头怎么说

的？“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这“Word”不是字，是言，我怀疑这才是“语言是存在之家”的根本背景，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意识上的语言本体。我对语言哲学表示怀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个背景。Logos，语言，理性，西方是这一套；但中国人讲情本体。我认为五四以来讲中西区别，没讲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学生2：**

我随便说一句。在西方宗教里，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太一样。W. Benjamin从犹太教来解释“word”就是命名；而Derrida的“word”是一种声音，是speaking-voice，然后再的文字。

**Moss Roberts：**

犹太教是父亲，基督教是儿子。儿子必定要杀父亲。这是历史的逻辑。

**学生3：**

所以还是回到您在《情本体、两种道德和“立命”》文章里说的，西方是理性对感情的主宰；在中国，理性是感情的外在表现。

**李泽厚：**

西方是理性至上，中国讲情理结构，即道始于情，还是道始于理的问题。西方是logic, reason, language，基督教的爱是上帝叫你去爱，是接受上帝那里来的命令，并且首先要爱上帝；中国人首先是爱父母爱子女，讲父慈子孝，为什么？它这是一种自然性的本能情感。动物也有这样的自然性的情感。中国把它从自然本能情感理性化地提升上来，把它理性化即道德化和伦理化。而上述西方人的情是服从外在理性的要求和命令，即上帝的旨意和命令，两者从根源上是不同的。我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讲亚伯拉罕杀儿子，西方把这种异常痛苦地服从上帝指令的悲剧性发展到极致，这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中国人很难想象这个问题。

**张旭东：**

情本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先回到刚才那个关于工具实践的问题。你要问的是直接相关的问题吗？

**学生4：**

对。老师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每天要使用多少工具。Marx讲过，人与动物的不同是我把一个木棍拿出来用了，但人与动物的区别还是个体的，还

有人与civilization的关系的问题，当你定义人的时候，你是从单个的人，还是从群体的角度来定义呢？

**李泽厚：**

在Kant书里我讲过，人是从一群猴子而不是一个猴子变来的。制造工具要传播开来，要模仿，复制，保存，然后传播到下一代，必须是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体。我讲的是大写的人，是一个群体，然后才到小写的人。

**学生4：**

这和刚才的subjectivity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李泽厚：**

对。用subjectivity来翻译主体性是不对的，它是个人主观性的东西。从大写的人变到小写的人、个体的人，到现在的独立的个体都是历史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我接受Marx的唯物史观。这和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们讲的个体是先验的，而非历史的。

**张旭东：**

两个脚注。主体和主体性确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我知道泽厚的倾向是很快从Marx回到Kant，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非Hegel式的联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大多是从Lenin到Hegel的这个传统去理解Marx，而不是从Kant到Marx。

**李泽厚：**

一个小插曲。当年我提出“要Kant不要Hege1”，引起好大的批判。其实这不是我说的，当时德国有一个哲学大会的标题就是“要Kant还是要Hegel”。我当时讲两个都要，但是如果非要我选一个，那我还是选Kant吧。

**张旭东：**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问题：为什么选择Kant带来这么多新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回头去看。但我想说Hegel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介。Hegel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历史哲学里都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主体？Hegel的主体肯定是自我意识，是精神，等等。但他一个讲法很有意思，他说，主体就是实体，实体就是总体。他不断地画等号，让哲学系的学生读着觉得很confusing。但他正是不断地以辩证的方式，把个人和集体，把此刻和历史联系起来，把个体的东西不断地还原到实体和总体，把瞬间还原到长时段的东西。那么这种实体性的主观性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一下子又回到

客观唯心主义去了，我们今天先不按照书本上的东西来谈，而是从李泽厚提出的问题出发。一种实体性的主观性，实实在在的主观性，或者说一个主观意识的总体或它的历史整体是否可能？我们是否能够用Hegel的实体的概念来解释Kant主体性和当代思想中的主观性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Marx的劳动的概念，我想说Hegel还是一个在Kant和Marx之间很重要的中介。虽然以前的人提出过以使用工具来界定人的本质，但是Marx把它系统化概念化的。我们先暂时往后退一步，先不说这么具体的制造和使用工具，我们退到劳动的概念。我觉得Hegel在精神现象学和美学里面的讲法在这一点上完全能讲得通，来解释刚才蒋晖关于精神和审美的问题。未必要从一个从基础到上层，从根本到具体的关系来解释。Hegel认为，劳动就是人的主观能力的外化，客观化，exteriorization，是主观能力不断外化并投射到一个客观外在的对象上，然后从自己的创造物，它可以是一首诗，一个term paper，一幅画，但这已经不是主观性了，而是行动，是实践，创造，是exteriorization，projection，也可以说是用符号把漂浮的思想固定下来，是自我意识的不断外化，不断投射到客观对象上。人通过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来认识自己的主体，这是Hegel的劳动的概念。这样一种从人的内部世界出发的不断的外在化和客观化，使得人从自己的创造物上认识到一个扩大了的自我。这个扩大了的自我被Hegel理解为个人和整体的历史。所以Hegel意义上的劳动似乎比纯粹从工具、技术的层面所讲的劳动概念要更广一些，其实我觉得和Marx的劳动也是一样的。我当然愿意采取李泽厚的读法，但我们也需要记住前面Hegel这种中产阶级史诗英雄的劳动。

**学生4：**

反对老师！一定要制造工具！

**李泽厚：**

对！完全对！就和我反对把实践的概念扩大化一样，我这里也反对把劳动的概念扩大化。语言和意识都是心理的，都是后来产生的。个人也好，集体也好，源头在哪里？还是在制造—使用工具，这才是历史的看法，其他的劳动都是派生上去的，这是人类的源头。我在六十年代写的人类起源便说这个问题。

**张旭东：**

这个是对的，我同意。

**学生3：**

您是否试图为人和动物作以下区别：人可以使用及制造工具，动物是使用

和制造工具。您认为动物也可以使用工具，但没有人的理论实践。所以制造工具才是真正的区分，对吗？

### 李泽厚：

可以澄清一下。使用工具以制造工具，这样讲更鲜明。使用工具是动物也可以做到的。而人制造工具的必要条件是：脑的发展，有语音，有一定规模的群体，有外在生存的压力、无工具便不能生存，等等。这些都是必要条件，再加上制造使用工具的多样性，就是充分条件。为什么强调制造工具？因为一般的动物都是用肢体作为工具的，而人发展到使用石头打石头，这最重要。这需有很大的心理能力，这使得人产生独特的自觉注意力，和动物的注意力不同，后者注意的对象往往是和自己自然的直接的需要相关。而制造工具不同，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达到另外的目的，与吃只有间接关系，这一点不可小看，非常重要，它在形成人的心理上是很大的飞跃，产生具有韧性的自觉注意力、想象和因果观念的萌芽，等等，造成很重要的人和动物的区别。这是起点。

### 学生5：

我对张老师的理解有疑问。Hegel所讲的劳动和劳动的外化并没有真正还原到社会关系，它只是在一个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个体和集体，并没有从劳动产生社会关系，这一点从Marx出发来看就非常清楚。强调制造和使用工具，一方面是反对Hegel的主体性建立在抽象的精神上；另一方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也就是为了把主体性放在八十年代直接反对教条僵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境下来理解。但这里面有一个基本问题，Kant所讲的主体性的形成是必须脱离具体的实践和经验的，也就是说不能在具体经验中找到主体性的确证，那如何来理解人的主体性既是来源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又是要脱离具体经验的呢？为什么在八十年代要谈主体性的问题，为什么要从Kant出发来打开Marx？

### 李泽厚：

直接反对的当然是国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书里也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批判和阶级意识，这是主观性的东西，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Marx首先讲的是物质生产。Kant哲学是先验的，在他那里认识的或者伦理的根源都是无法解释的。伦理学就是来自先验的绝对命令，要和经验完全脱离开。我认为这实际强调的是人性心理能力的构造和培养，我把这叫作人性的心理形式，或者叫文化心理结构。人的能力和人的知识不一样，知识来自具体经验，能力来自人的心理结构，伦理学是这样，认识论也是这样。Kant之高于英国经验派，不

像Locke，什么一张白纸，就在于他先有一个结构，然后去对付外在的世界，人向自然立法。这种先验的东西，他认为是超越经验的，而我恰恰要把它归于人类经验的积累。先验是从人类经验提升积累沉淀即积淀而来，对个体来说是先验的，但从人类来说，是通过经验积累得来的，并通过教育（广义）而传递给后代。以对小孩的教育为例，你教导他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久而久之，就由开始的强迫慢慢变为内心的自觉，变为道德，这就是通过教育构造出个体心理的一种形式，一种能力。Kant讲得很清楚，人之所以为人，在道德上的特点是人的理性绝对主宰感性，我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欲望或者生命来做一些事情，比如革命。个人的感性的一切，欲望，甚至生命都可以牺牲掉，因为有比个体存在更高的东西，Kant把这叫作绝对命令，在我看来，这种绝对律令作为心理形式心理能力，是为了人类的整体生存所最需要的东西，对人类很重要。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牺牲自己，这使人觉得最值得佩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是中国的三不朽，第一是立德，建立人的道德精神，或者我讲的心理形式。再举个例子，你们看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四个人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两个是认罪忏悔的，有两个是顽固不认账的。但最后你想想心里佩服谁？（张旭东：还是佩服江青和张春桥。）这是什么原因？这超乎你的功利，这种超功利超因果的精神本身对人类而言是重要的，是有独立价值的，所以Kant把这个提得很高。但Kant哲学不是人类学背景，而是神学背景，那就是上帝。在Rawls的《道德哲学史讲义》里就讲Kant所讲的道德有很厚的宗教背景。我把它归结于人类学，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发明吧。

### **学生2：**

您讲得特别好！现在您在谈两个问题，第一是需要靠使用和制造工具使得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第二，人又要为一个全人类的要求坚持道德信仰。那么这不是一个使用工具的角度，那么怎么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

### **李泽厚：**

为什么使用和制造工具有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意义？个体是在群体里面，一开始个体可没有想到人类。一开始是为了群体的利益，群体要求个体配合，这里面就有伦理，有规则和要求。所以，我认为伦理先于认知，命令性的东西是从这里来的。命令句先于也高于陈述句。

### **学生2：**

是人的先验的心理结构要求他去使用工具吗？

**李泽厚：**

不，是为了生存。但到了一定量的时候，群体要求个体做某件事情，所以组织和指令产生了，然后慢慢表现为一种伦理。

**学生2：**

可是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也会为了生存牺牲自己，这可能跟使用和制造工具没有关系，这可能是生存的绝对欲望。

**李泽厚：**

Karl Kautsky的《唯物史观》巨著就讲人的道德来自动物道德，不对。这只能说明动物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前提。但到了人类变成一种心理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来牺牲自己。而人能有自觉意识又是因为语言的保存。这是很不相同的。

**学生4：**

您以制造工具来作为人的起源，但又说人的牺牲或者放弃部分才来建立一个更大的文明，这又是一个放弃的过程，而不是建立在制造工具的基础上。

**李泽厚：**

我的回答是，这种牺牲自我的心理能力最初是在制造—使用工具为根本基础的群体实践和生活中要求和形成的，当然经历了漫长的百万年的过程。这就是伦理。两者应该区分，道德是内在的心理，伦理是外在群体秩序的要求。它与使用制造工具并无直接联系，而是与人际关系连在一起的。

**张旭东：**

这种讲法是超越哲学或者思想内部派别的一种考虑方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Nietzsche，Nietzsche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跟你刚才说的很像，是在生物学或者说进化论的意义上，Nietzsche说，我们人为了生存就必须发展一种残酷的恶的东西，否则你在自然里面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它太保护弱者了，弱者在动物世界里是应该被吃掉的。所以根据一种先验的绝对的道德指令，人就不应该是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有恶，由自然状态来支配。所以Nietzsche就回到了，按照泽厚的讲法，一种长期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绝对的道德指令。但在Nietzsche这儿就是超人，是永恒的历史复归，否则就是颓废。动物界不能容忍颓废，那么人同样不应该容忍颓废。对，还有前面讲Hegel抽象劳动的外化没有产生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在精神现象学里面本身就讲得很不清楚，它是讲一个人的故事，还是集体的故事，你是把它当小说读，还是当科学读？如果要替

Hegel辩解的话，这是一个抽象的自我意识，然后外化，再回到自我意识，Hegel的历史是一个自由增长的历史。但是进入社会关系的这个瞬间是在主人—奴隶的辩证法里才开始的，即一个自然个体在生存环境中遇到的另一个人，通过竞争产生服从的关系，Hegel认为这是现代历史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以前的人没有历史。但这并不解决泽厚提到的，在意识的问题产生之前，还有一个制造工具的群体性的物质生产的前提，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刚才蒋晖点到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劳动和人的文化道德心理世界的关系到底是决定论呢，还是辩证的呢，还是并存的？它们各自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

**学生2：**

G.Luacs吊销了关于起源的问题。Kant的提法是一个结构主义式的解决，不要问这些范畴从哪里来，我们是放在一个结构里面来讲，是抛弃了人类的起源的问题。

**李泽厚：**

我不赞成吊销和不解释。西方一般都强调先验就是先验，不讲了。但中国人来讲不同，中国人会问这“先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上帝赐予的么？如果不信上帝，又如何办呢？中国强调历史意识，强调传统，重视发生学的东西。当然我不是搞发生学的，我是从哲学上来看待这个发生的问题。到底是语言在先，还是工具在先。我的看法是，很难说是先有一套语言。但要有足够的语音能力来保存使用—制造工具的经验的语义。这两方面是否并进的呢？是的，一个是内在的心理成果在积累，一个是外在的物质创造在积累。所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历史性的成果。那么双向并进中，到底哪个是决定性的？我认为物质性还是第一位的。人活着是第一位的，生命的存在最重要，即吃饭哲学。人作为生物性的生命存在必须首先要活着，就是吃饭，是使用和制造工具来“吃饭”即获得食物。不管Marx是不是这么讲，我这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老一套就是不变。人的物质生存第一性，物质第一性当中使用和制造工具又是第一性。使用制造工具当然包括不断改进、更新、创新等等。

**学生6：**

您说语言可以保存使用和制造工具的理性经验。那么您在讲巫史传统的时候，并没有讲语言，而是把巫从象形的角度来理解为“度”——尺度，所以您提出了“度”的本体论。那么回到张老师和蒋晖的问题，我们从具体的劳动到抽象的意识或者审美，能否从“度”的方位建立一个中介？如果可以，那么